

中国现代名家作品精选系列

郁遼夫

小说



黄乔生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小说 / 黄乔生编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11

(中国现代名家作品精选系列)

ISBN 978-7-5143-2389-4

I. ①郁… II. ①黄…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5439号

郁达夫小说

编 著 黄乔生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5mm×925mm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389-4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言·郁达夫其人

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兄弟三人，大哥从政，二哥行伍。郁达夫天资聪颖，七岁入塾读书，九岁即能赋诗。1908年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徐志摩。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堂、美国教会学堂之江大学预科等校学习。1913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创造社，7月，发表短篇小说《沉沦》，震惊文坛，同年10月出版《沉沦》，是为中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后又编《创造周报》、《洪水》等刊物，曾任教于北京、武昌、中山等地多所大学。1928年，与鲁迅合办《奔流》杂志。1929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成立自由大同盟。1930年3月，与鲁迅等列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1933年4月移居杭州，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赴武汉加入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12月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纸

副刊，曾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期间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因通日语，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终年49岁。据推测系为日军所杀。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著作版本很多，1949年以前出版的大略有：《沉沦》（短篇小说集，1921）；《茑萝集》（小说、散文合集，1923）；《小说论》（1926）；《文艺论集》（1929）；《戏剧论》（1926）；《寒灰集》（《达夫全集》第1卷，1927）；《文学概说》（1927）；《日记九种》（1927）；《鸡肋集》（《达夫全集》第2卷，1927）；《过去集》（《达夫全集》第3卷，1927）；《孤独者的愁哀》（戏剧集，1927）；《迷羊》（中篇小说，1928）；《奇零集》（《达夫全集》第4卷，1928）；《达夫代表作》（小说、散文合集，1928，1930）；《敝帚集》（《达夫全集》第5卷，1928）；《在寒风里》（小说、散文合集，1929）；《薇蕨集》（《达夫全集》第6卷，1930）；《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篇小说，1932）；《忏余集》（小说、散文合集，1933）；《达夫自选集》（小说、散文合集，

1933);《断残集》(《达夫全集》第7卷,1933);《浙东景物纪略》(散文集,1933);《屐痕处处》(散文集,1934);《达夫日记集》(1935);《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1935);《达夫游记》(1939);《达夫散文集》(1936);《闲书》(散文集,1936);《我的忏悔》(散文集,1936);《藤十郎的恋》(剧本,1937);《郁达夫文集》(小说、散文合集,1948);《达夫诗词集》(1948);《郁达夫游记》(散文集,1948)。从这个目录中可以看出,郁达夫是一个多产作家,也是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作家。

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全集》(12卷)。

《郁达夫作品精选》分为散文、小说两卷。郁达夫的小说,颇有自传性质,与散文有紧密的联系。现将两种体裁合并做一简略介绍。

私文学

1920年到1933年,郁达夫在其小说名满天下的同时,写了26篇抒情性散文和60余篇议论性杂文,表现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失望的慨叹。这个时期的小说和散文,均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无所顾忌地对现实和虚构中的“我”的思想、生活细节做详细的描写,热情呼号、纵情宣泄,有鲜明的“自叙传”风格,忧郁感伤的情绪却也充斥字里行间。

1933年到1938年,郁达夫的人生进入低潮期。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和个人生活状态的变化,他消极避世,追求“名士”风范,流连山水,讲趣味,谈闲情。这个时期的小说,除了反抗社会、同情劳苦大众的篇什外,率多描写个人悲欢,带有浓厚的颓废色彩;散文则以描写山川景物和风俗人情的游记为多。

郁达夫后期写作,多文艺评论和社会批评,小说写得不多。

20世纪20年代末,郁达夫在《洪水》杂志上发表了《日记文学》一文,大意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知晓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

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对郁达夫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鲁迅认为，体裁不关重要，只要读者知道作品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就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如果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鲁迅说，他自己宁看《红楼梦》，也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之类；他不喜欢《板桥家书》，而喜欢看郑板桥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郁达夫提倡日记体、书简体，自己的确也出版了不少此类文字，不惮于暴露自我，但是否做到完全真实，也有疑问。

其实无论用何种体裁写作，作家都是在表现自我。文学既然是为人生的，当然也就包含着为“我”的意思。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过，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另一位法国作家福楼拜甚至说，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包法利夫人就是他本人。郁达夫说：“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 Individuality 是决不能丧失的。”郁达夫很喜欢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作为贵族知识分子，其性格、人生哲学及其对女人的无责任的态度等，完全是屠格涅夫从“自己的全身中控制出来的”。郁达夫虽然是医学和经济学出身，但从小就喜欢文学，有深湛的文学修养。他在日本期间，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如他本人所说，单是俄德英日法的小说，就有一千部左右。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私（私，日语“我”的意思）小说”流行。“私小说”多写身边琐事、个人欲望，表达苦闷、孤独和忧郁。在日本“私小说”作家中，郁达夫最推崇佐藤春夫和葛西善藏。他的早期作品如《沉沦》、《南迁》等，写变态的性欲、潦倒的命运和孤独的悲哀，赤裸裸地揭示自己的心境，就明显带有“私小说”的印记。

无论散文、小说，还是诗歌，郁达夫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自传色彩十分浓厚，是那个时代的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典型代表。

郁达夫是一个诗人，他有几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诗人，如《采石矶》《二诗人》等，他的一些旧体诗杰作就镶嵌在散文和小说中，有些诗句往往是他本人生活的传神写照：

曾因醉酒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在他的小说中，读者总能感觉到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存在，无论是“我”、“他”、于质夫、文朴、伊人、李白时，或者古代的黄仲则、厉鄂等，无不是从他自身生活中“捏制出来”的，都有他本人的影子。《沉沦》中主人公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他进了K府中学之后，不上半年又忽然转到H府中学来”……这正是郁达夫自己的生活经历。《空虚》里写于质夫从日本回到中国，“才觉得自家是同一粒泥沙”，“中国的社会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直把学校里出身的人看得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郁达夫在日本10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士学位，回到上海，却陷入失业和贫困。他发表了《沉沦》等小说后，颇受责难，被指为“颓废”，以至于不能受聘于学校。《青烟》里写“我”因为写了几篇小说，受人攻击，“每天只是郁郁的；跑上北又弄不好，跑上南又弄不好。”他甚至把自己衣服的式样，乃至外貌，也写进了作品。《南迁》中那个身穿“藤青色的哗叽的大学制服，头发约有一寸多深”的“我”，以及《银灰色的死》中那个脸上长着胡桃似的眼睛，脸色灰白，面上颧骨高出的清瘦的人，就是郁达夫。此外，《春潮》、《茑萝行》、《十一月初三》、《烟影》、《祈愿》、《纸币的跳跃》等小说中，也有郁达夫本人的影子。

郁达夫追求本真，着重暴露，敢于写人所不敢写。他认为，作家应该把“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郁达夫的坦诚，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是少见的。他的愤世嫉俗、自我暴露乃至自我作践，一方面极大程度上暴露了现实的丑恶，但另一方面也触及他人和自己灵魂的

污秽，暴露自己的阴暗思想和邪恶感情。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为了摆脱苦闷，放纵自我，沉溺于醇酒美人，性欲得不到正常满足时，就寻花问柳。失意落魄时，怨天尤人，咒骂环境、制度和他人。不过，这些负面的情绪，有时会得到升华，而具有“点石成金”功效的元素就是爱国主义情绪。因为作者写的虽然是个人，但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特点和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因此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正是顺理成章。如《沉沦》里通篇描写男女性爱、性苦闷，结尾却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呼号，颇能得到一般苦闷的青年读者的共鸣。

女与性

郁达夫的生活离不开女人，他的作品自然少不了女人。女人是他感情的慰藉，奋斗的动力，创作的源泉。对女性的描写，是郁达夫作品的一大特色。把郁达夫的诗歌、日记、散文、小说结合起来阅读，能更好地把握郁达夫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思路。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话：“我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1927年，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

郁达夫特别重视表现人的性爱本能，认为人的“种种的情欲中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所以他的小说中对性苦闷、性变态的描写很多。1921年，郁达夫的《沉沦》以大胆真实的人性描写震动国内文坛，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郁达夫热”。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攻击，有人称他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骂他“海淫”；《迷羊》写“我”的纵欲无度；《茫茫夜》写于质夫“向善的焦躁和贪恶的苦闷”；《十三夜》写陈君对尼姑的刻骨相思；而《她是一个弱女子》写李文卿和郑秀岳的同性恋，过分渲染和突出人的生理因素，不乏低级庸俗的自然

主义描写，为郁达夫招来一些负面的评价。《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后不久，就被禁止发行，其理由，除了宣扬“普罗文学”，还有“妨害善良风化”。

郁达夫是幸运的。他一文坛，在得到很多指责的同时，也得到了当时文坛上地位很高的批评家周作人的支持。周作人在《〈沉沦〉》一文中引述美国莫台耳（Mordell）的《文学上的色情》里的论述，将所谓“不道德的文学”分为三种。郁达夫的作品属于第二种，即“是非意识的，这一类文学的发生并不限于时代及境地，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海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与颓废派的著作，大抵属于此类”。周作人说：“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褻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猥褻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因此，《沉沦》“虽然有猥褻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郁达夫对此十分感激。他后来在《郁达夫代表作》一书的扉页上印上这样的题辞：“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不过，见识通达的周作人，在充分肯定《沉沦》的艺术价值后，对其可能社会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打了一剂预防针：“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

尽管如此，郁达夫作品中过于暴露的性描写仍然引发很多非议。郁达夫倾向革命文学组织后，其生活作风和文风成了文坛左右两翼攻击的对象，动辄得咎，处境尴尬。

1934年9月，苏雪林在《文艺月刊》第六卷第三期上发表了《郁达

夫论》，对创造社部分成员做了严厉批评：“郭沫若仅诗歌略有成绩，小说戏剧散文均卑不足道。郁达夫和张资平则过去几年内很出过一阵风头，现在张资平已经有落伍的趋势了。郁达夫只好写些日记游记之类来维系旧文坛地位，虽然很寂寞，一般人对于他还有相当的信仰，所以我现在先论他。”苏雪林认为：中国民族本来“最喜谈闺阁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有些读者则抱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这位作家下流荒唐的自述，究竟还要写到什么程度为止。像著者购读郁氏作品的心理便是如此。郁氏作品之不脛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两个缘故。”“郁氏虽号为颓废派作家，但并没有西洋颓废派的技巧，不过利用那些与传统思想和固有道德相冲突的思想，激动读者神经，以此获得人的注意罢了。”她的结论是：“这样一个元气被酒色断尽的作家，我可以断定他永远说不出一句有力量的话了。”

鲁迅与郁达夫一向保持平稳的关系，时或惺惺相惜。鲁迅曾说，他与郁达夫“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还幽默地说，在他看来，创造社同仁中，郁达夫是唯一脸上没有“创造气”的人。不过，鲁迅对郁达夫的认识并不全面，他们的交往多在日常的谈天宴饮，最多是有一个短暂时期合编杂志，但也多偏劳鲁迅。鲁迅甚至明言，对于文学的意见，他与郁达夫恐怕是不能一致的。而当涉及道德层面时，鲁迅更少谈论郁达夫。

然而，鲁迅的弟子对郁达夫就不像鲁迅对他那么有好感。1936年2月8日，与鲁迅关系较为亲密的文学青年孙用写信给鲁迅，表达对郁达夫的不满道：“郁达夫先生，我从来不曾见过，我只读过他的一小部分作品，对之原来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在杭州了，到处发表文字，我就多了看到的机会。这却加强了恶感。他的肉麻当有趣的言行，在《宇宙风》发表的日记中，可以知道一二。”孙用指出，郁达夫所发表的日记中，有借坐市长的汽车，有某君的唱和，某长的宴会，有丝绸某同人的聚餐，有打牌，有喝酒，而略去了日常的吃茶吃烟吃饭性交，也略去了风流香艳的替明星披大衣，深更半夜访问睡了的美人鱼。孙用义愤填膺地斥责

郁达夫在“无耻地播着卑劣的种子”。他在信中提到鲁迅同郁达夫的交往，向鲁迅发出质疑道：“我在《集外集》上见过先生送他的一首诗，这使我不舒服；稍近，又在《宇宙风》上见到他的日记：‘十二月七日访鲁迅’，也使我不舒服。我常想着：先生怎么会和他在一道儿的呢？”他还写了批评郁达夫的文章《做旧诗》及《Biaolian（不要脸）日记》，寄给鲁迅。

现存鲁迅书信中，未发现鲁迅给孙用的回信。这可能是孙用与鲁迅的最后一次通信。对郁达夫态度的不同，或者竟成了师徒疏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郁达夫推崇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和自传体小说《忏悔录》。卢梭在作品中提倡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在讲述了自己一生的事迹时，毫无掩饰地写出他因社会恶习的污染而做的丑事，同情人的七情六欲，以本真的感情尽情暴露人的被压抑的情欲和性心理，如变态性欲、手淫恶习、寻花问柳等等。郁达夫学习卢梭的榜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求真本是积极意义的人生态度，郁达夫维护作品的本真，认为如果作者创作小说带有功利目的，那么真实性就会减少，没有了真，作品的价值就降低了。他惟恐文章掺杂了虚假的成分。由于过分追求本真，他把性苦闷、性变态，颓废的心灵，纤毫毕现，一展无余，甚至反复渲染，给读者带来不愉快的审美体验。如《空虚》里写于质夫，睡倒在少女刚睡过的地方，“两手放到身底下去作了一个紧抱的形状，他的四体却感着一种被上留着的她的余温。闭了口用鼻子深深的在被上把她的香气闻吸了一回，他觉得他的肢体都酥软起来了。”以赞赏的口吻写近乎变态和病态的感受，已无美感可言。

在艺术创作中，偏颇会损害美感。灵与肉的冲突，道德与本能之间的纠结，不能过分渲染，变本加厉，而需要用艺术的手法来疏导和平衡。

个人与国家

郭沫若曾把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和郁达夫的“卑己自牧”称为文坛的“三绝”。自卑心理使人神经过于纤细，难以承受哪怕极其微小的社会压力和外来打击。物极必反，愈是自卑的人，愈要在外表上表

现出一种孤傲态度，愈要率性而为，愈要大胆展示和暴露自己，以近乎歇斯底里的冲动来追求真、表现真，任由感情宣泄，并且宣泄过头，乃至自暴自弃，以此作为对自卑心理的补偿，却又很容易误入“伪”的歧途。

自卑心理的形成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不幸的童年经历是其中之一。参较阅读郁达夫的散文作品，有助于理解其为人和小说创作。

父亲的早死，家道的败落，使郁达夫的童年生活孤立、贫困，使他“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他在《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中记述，他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成绩优异，跳了一级，春天开学的时候，母亲辛辛苦苦为他筹集了学费后，他又向母亲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母亲给他买一双皮鞋，母亲明知无钱可又不愿让儿子失望，于是领着他上货店去赊，结果没有一家货店老板答应，母子二人空手回到家里，抱头痛哭。这件事对郁达夫刺激很大，“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此类经历不但使郁达夫形成了浓重的自卑心理，而且培育了他心灵中仇恨的种子，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0年的留日生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他深切地感到了弱国子民的悲哀。由于中国积弱不振，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备受歧视，“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在日本的10年，郁达夫正值青春期，生理发育带来他对爱情的向往和对异性的渴慕，但日本少女对中国人的歧视和高傲，使郁达夫渴望爱情而不可得，“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着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子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

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个人的自卑终于找到了印证或者可以归咎之所——国家。

回国之后，郁达夫一直为生计而忙碌奔波，教书和创作，很大程度上都为稻粱谋。他说：“一生没有使我安逸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贫，却是没有法子可以驱除得了。我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贫’这‘穷’恐怕在我死后，还要纠缠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为孤儿寡妇，没有钱也是养不活的。”长时间颠簸流离，加上自己不善经营，致使贫穷像影子一样紧紧地缠绕着他，使他整日抑郁不安，心情难以舒展，因而自感无能，感到对不起妻子儿女，于是更加自卑。再加上理想的难以实现；抱负的无法施展；社会的重压与摧残；身体的孱弱，二十几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天生多情而又“性知识发育落后”，“胆量，变得异常的小”，这些都是郁达夫自卑心理形成的原因。

因自卑而自我压抑，进而自我暴露，最终疾病缠身，欲求解脱，这是郁达夫早期小说中所谓“零余者”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他们因人生道路上的种种不如意而内心愤懑，消极颓废、自怨自艾，以性的幻想，表达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小说集《沉沦》中的三篇以留学生为主人公的小说，主题都是病和死：《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死于脑溢血，《沉沦》的主人公得了忧郁症，最后蹈海自杀；《南迁》的主人公伊人，则由于身体衰弱到安房半岛疗养，却发烧得了肺炎。从郁达夫的散文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他本人体弱多病，时常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不知秋风吹落叶的时候，我这孱弱的病体，还能依然存在地球上否？”而性、爱欲、压抑和疾病，最终指涉了民族国家的主题。这是不难联想的：个人有病，国家也有病，而个人疾病的起因却正是国家。作者把个人的情欲苦闷转化成对祖国的爱，因此获得了治愈，得到了升华，并成为一个人健康的人，作品也成为健康的文本。因此，人们习惯上把郁达夫的文学作品诠释为具有净化和治愈的功能。实际上，郁达夫的作品仍然有病态，不能因为最后的几句呐喊而变得纯净和健康。用祖国、人民等概念进行升华，或者把个人的不幸归咎于国家社会，刚开始能吸引一般读者的眼球，引发他们的同感，但看得多了，人们就会感到其牵强和矫情。鲁迅

在小说《孤独者》中就对此类人物做了讽刺性描写。“我”去访问主人公，两人交谈不能尽兴，原因之一是有其他来客打扰：“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人’，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有研究者把鲁迅的作品解读为“民族寓言”。“民族寓言”是美国文艺批评家杰姆逊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写作，都不可能仅仅是私人的写作，当他们写纯属私人东西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写关于家庭、社区、组织、国族等集体性的东西。郁达夫的作品弥漫着一股消极颓废的情调，有时过于耽溺性爱描写，但在大多数小说中，主人公对自己的种种荒唐举动和欲望冲动做了忏悔和自责，并且将同情扩大到广大同胞。通过这种方式，郁达夫描写了祖国、民族的苦难和同时代人的不幸与精神危机，描写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某种生存状态，或者说某种人的心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此，无论有怎样的缺点和不足，郁达夫的作品也仍然堪称中国近现代民族寓言的一部分。

散文与小说

郁达夫小说的结构，有分明的诗化和散文化特征。他在小说中常用诗的语言直抒民族苦难的忧患意识和个人身世的凄凉之感。他喜欢用自由随意的笔法来写小说，不讲究剪裁布局。他的小说的叙事模式是流浪汉式的，而流浪汉式的主人公又经常遇到倡优一类人物。例如，与中国留日学生、落魄文人相遇的多为不幸的侍女、优伶、女工等。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和女工陈二妹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我”由于失业搬进了贫民窟，偶遇在工厂做女工的陈二妹，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互相给对方以鼓励、慰藉。郁达夫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古典文学修养，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塑造了郁达夫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他将西方小说和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结合起来，游走于叙述和抒情之间，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表达空间。

郁达夫把散文的结构特点运用于小说中，打破了传统小说在结构上

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上有因有果、前后完整的写法，形成了自然流动的抒情形式结构。如《沉沦》写了八个生活片断。第一节是引子，写主人公傍晚拿着一本诗集到田野散步；第二节开始回顾在班上的生活；第三节插叙一段他的家世；第四节写对爱情和异性的渴望；第五节写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沐浴；第六节写偶遇和偷听男女的幽会；第七节写去妓院嫖妓；最后一节，离开妓馆，自责自怨，跳海自杀。整篇小说以事件片断或一个个生活场面贯穿起来，呈现出主人公心理情绪的波动过程。郁达夫的目的并非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而是要抒发青年人生存的焦虑、爱情的不幸和痛苦。情绪引发情节，情节服务于情绪。

这种体式在一个特定时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但也引来“结构松散”的批评。以“我”为中心线索、围绕着一两个人的生活的“自叙传”，增加了抒情性，有利于写出个人的情绪流动和心理变化，但缺少故事框架，缺少曲折生动的情节和细致周密的结构，因而造成很多小说跟散文几乎没有区别。

郁达夫把诗和散文的结构元素引进小说，虽然带来机构松散的毛病，但也对小说艺术起到丰富的作用。我们将他的小说和散文结合起来看，互相对照印证，受到的启发当是多面的丰富的。

本书的小说卷收入《沉沦》、《南迁》、《迟桂花》等 26 部中短篇小说，大致按创作年月顺序编排。散文卷则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自传和其他一些自传性文字，即作者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 月末（其中 1 至 7 篇是在 1934 年冬至 1935 年春末）陆续写成的自传 9 篇及《归航》、《风雨茅庐》等；

第二部分是游记文字。按照编年顺序精选若干篇，偏重于作者边叙述描写边抒发感触的篇什；

第三部分是怀人之作。收入作者怀念、悼念或题赠亲朋好友的文字，其中包括写老同学徐志摩的两篇，怀念朋友鲁迅的三篇。

本书的注释，分为题注和正文注。题注说明该文最初发表于何种报刊（所载报纸注明年月日，期刊注明年月和期数）、署名及编入文集等情况；正文注释采用脚注形式。除照录作者原注并加标识外，对容易造成阅读障碍的古典今典，稍加解说。为避免冗繁琐屑，对于常识性的典故或专有名词不予注释。

编者

2014 年 7 月于北京